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

实践历程与路径选择

郭晗 任保平¹

【摘要】：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演进，可知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不可复制性与贫富分化困境所带来的不可持续性。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这就要求必须将共同富裕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了关于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未来必须解决好效率与公平、共建与共享、物质与精神、区域与城乡、“提低”与“扩中”等问题，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贫富分化困境 人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2）07-0016-10

中国进入现代化是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中国人口众多，规模巨大，进入现代化将深刻地改变世界现代化的格局。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和特征，中国进入现代化，对全世界现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形成了重大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中国何时实现现代化”相比，“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是一个更加值得探索与思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这一重大判断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本质与特征。中国必须以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为关键目标，努力推动人的共同发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一、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贫富分化困境

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深刻变化，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的过程。世界各国如何进入现代化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大命题，很多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有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分，从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和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化道路的多元论逐渐取代一元论，而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冲突与人的异化也引起了普遍反思。

（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世界开始进入现代化与西方世界的兴起是总体同步的，很多学者将这两大历史事件等

¹**作者简介**：郭晗，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任保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安财经大学副校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结构转化机制研究”（18CJL01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新常态下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与路径研究”（17JHQ030）

同起来，从西方寻求现代化的原因和动力，这就导致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般性被过度解读，形成了现代化道路的一元论。

马克斯·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视角解释了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推动力，并由此发展出“韦伯之问”，即“中国、印度等东方社会为什么没有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与这个问题类似的是世界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提出的“孔飞力之问”，即“为何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但无论是韦伯所指的“理性化道路”还是孔飞力所指的“近代国家”，其本质都是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在这两个问题中暗含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加州学派对“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模式的一般性意义提出了质疑，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3]都指出，欧洲超越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力量是在 1800 年后才发生的现象。

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完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在此之后，世界才从多元化转向以英国现代化模式为特征的西方中心主义。但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是多元的，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中指出，英国现代化模式并非唯一道路，并且有其局限性^[4]。李伯重对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提出江南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历史的延续”，而基于乡镇企业的乡村工业发展，更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5]。

总体来看，学术界对现代化的认识总体上经历了“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传统认识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逐渐被更多人所扬弃。正如社会历史学家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序言中所指出的，“现代世界的研究，需要超越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建立一种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科学，那将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成果，它根植于世界所有主要地区，并在世界各地根深叶茂。

这将使我们能够摒弃任何学者个人、任何学者群体的著作中必然持有的各种偏见。”^[6]因此，对现代化的研究，需要从更宏观的视野出发，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与偏见，在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归纳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

（二）贫富分化的困境：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反思

西方现代化模式之所以影响深远，主要源于在近两百年来东西方“大分流”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过去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正是在如此巨大的成就之下，西方现代化模式成为很多后发国家学习的“模范样本”，并被总结归纳为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而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社会特征甚至被称为“历史的终结”^[7]。

20 世纪 90 年代“苏东剧变”后，践行“休克疗法”以试图模仿和复制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国家有很多，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绩效来看，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模式的不可复制性。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特征，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

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的工业化，而先发国家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对殖民战争来完成的。在“二战”后所形成的新的世界体系下，通过殖民战争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为现代化创造条件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再寄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后所形成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来实现现代化，无异于本末倒置，倒果为因。

这不仅无法取得现代化的成功，一定程度上还要承受落后的经济基础与盲目模仿的上层建筑不匹配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后发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面模仿，也就变成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依附。

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巨大的贫富分化。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中利用 18 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详细论证了当代西方国家贫富分化的客观趋势，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而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8]。

近年来，这种贫富分化的困境并未得到缓解，反而有加重的趋势。以美国为例，尽管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但是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日益成为其社会顽疾。一方面，受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影响，美国的蓝领和部分中产阶级面临的失业等问题日益加重。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刺激政策使得本就处于超发状态的美元持续进入资本市场，推升了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分化，经济呈现“K 型复苏”状态。巨大的贫富分化，逐步演变为阶级冲突与社会割裂。在社会冲突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保守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逐渐抬头，成为美国社会动荡的隐患。

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贫富分化现象的背后，其实质是以物为中心的资本逻辑所带来的“人的异化”。马克思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深刻地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论证了私有财产与劳动异化等命题，并进一步阐明了这种异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来看，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尽管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但也确实出现了无法回避的矛盾。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施的诸如减少金融控制、私有化、削弱工会、降低税率和减少劳动保护等政策措施加剧了资本和劳动的冲突。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劳动的异化演变成人的异化，物质财富的差距演变成普遍性的精神贫瘠与社会焦虑。

二、中国式现代化及其与共同富裕的关联

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来看，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特点是“后发追赶性与前瞻反思性相同步”，即同时面临追赶与反思的任务^[9]。既要作为后发国家实现对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赶超，又要在反思西方现代化实践负面效应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来推动现代化路径的创新。

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创新与超越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是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的超越。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这是对处于“分化困境”的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实现这样的创新与超越，必须将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目标。

（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10]，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前世界发展的总体格局来看，已经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基本都遵循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贫富分化的困境。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体现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征，就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会成为中国自身发展的成就，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就。

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开拓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的发展目标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变成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要求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防止出现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贫富分化困境。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在吸取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成果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共同富裕作为关键目标，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必须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现代化最早起源于西方，欧美国家率先以工业化进程推动现代化，强调的是以资本为中心，遵循的是资本逻辑，而不是人本逻辑。资本的逻辑就是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我增值。因此，以资本为中心，必然会将物质财富扩张的目标凌驾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之上。在这样的现代化模式下，人是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但对工人阶级也形成了剥削与压迫，这是造成人的异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它要求打破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形成现代化的人本逻辑。人本逻辑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劳动主体论，这就要求必须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主线，把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目标^[1]。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是所有人都能够具有发展自身的机会，而不是在物质上搞平均主义。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应当避免的就是物质财富增长中人的异化，也就是以物的发展替代人的发展。而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只有少数人具有实现个体发展的机会，大多数人是被异化的，其劳动是被动的异化劳动，不是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创造性劳动。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下，追求现代化必须要实现人本身的现代化，物质财富的增长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必须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关键目标。

（三）公平可持续的现代化必须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共同富裕不仅同生产力相关联，而且同生产关系相关联，是涉及社会公平的关键问题。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追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都是有价值的目标，但二者之间的包容性在不同发展阶段有所不同。在低收入阶段，为了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起飞，早期的快速增长很可能是以对贫富差距保持一定容忍度为代价而实现的。但在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过度的贫富分化会对社会公平形成巨大挑战，成为现代化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

贫富分化对现代化持续发展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贫富分化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侧动能的抑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都可论证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继而对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二是贫富分化会导致社会流动性的降低。人们一旦接受贫富分化带来的“机会不公平”，就不会再相信勤劳致富，就会造成现代化发展中的负向激励。

实现公平可持续的现代化，必须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中国现在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 万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但仍然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任务。根据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教训，克服贫富分化困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路径。因此，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就是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这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的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证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与历史逻辑

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社会理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历经百年奋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致力于在发展中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形成了以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历史逻辑。

（一）“耕者有其田”：共同富裕的早期理念与实践探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共同富裕理念与实践的早期探索。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将“耕者有其田”作为奋斗目标，强调解放劳苦大众，实现公平分配。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早期思想和基本理念。

李大钊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12]。他进一步指出，土地是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实现土地的公平分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同志在 1927 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紧迫性。

在后来的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区域性开展了土地改革，而“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周恩来同志指出，“使生产者公有其产品，而共同分享之，这便是共产主义所由来，也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给以明确证明的”^[13]。整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对共同富裕思想理念的早期探索，领导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从而形成了追求共同富裕的早期实践。

（二）确立公有制：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基础构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共同富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结构，也初步形成了我国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1955 年 10 月 29 日，毛泽东同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4]

随着 1956 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城市全面实行了公有制经济，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转变为 90% 以上占比的公有制经济，外加少量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这一转变为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但是，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实质是接近于“平均主义”而非“公平主义”的分配制度，效率较为低下，缺乏激励，实现了“共同”但未实现“富裕”。

（三）先富与后富：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构建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进行了创新性的理念和实践探索，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对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证，给共同富裕赋予了新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5]。这本质上是论证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与过程的差别，即目标

是“共富”，但富裕的“次序”有先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这样的政策导向对共同富裕进行了三层内涵上的拓展：其一，允许“先富”意味着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其二，“先富”的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其三，“先富带后富”意味着最终目的仍是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两极分化，允许“先富”不是允许存在富与不富的差别，而是允许存在富裕先后次序不同的差别，是允许富裕速度有快慢不同的差别。

在这样的共同富裕理念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推行了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极大地提升了经济效率。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这一时期，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均有所扩大，开始形成一批“先富”群体，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同富裕的初心并未改变。江泽民同志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16]。胡锦涛同志也提出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7]。2002年后，随着对“三农”问题的不断重视，以及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社会救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逐渐趋向缓和，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础。

（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与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伟大壮举，并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对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道路和步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8]。这实际上是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问。

从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理论的新探索来看，党的十八大后，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转变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国分配体制改革的侧重点放在了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等方面，在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就业和脱贫攻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最终于2020年实现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在“两个一百年”目标交汇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要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一步。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总体来看，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带领全国人民在推动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富裕问题，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征。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共同富裕，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主要是通过共同富裕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19]。具体而言，要从五个方面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统筹效率与公平，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要解决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共同富裕必须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产物，其不可能与低水平生产力共存。推动共同富裕之所以“难”，是因为其要解决好发展生产力与共享

生产成果的关系，也就是“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2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关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特别是重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因此，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能异化为“总量富裕”和“平均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国家层面的“总量富裕”，而是能使发展成果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因而要以共享发展为思想理念引领，推动财富结构和收入结构再平衡，提高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包容性。共同富裕也不是人民的“平均富裕”，由于个体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个体差别不可能完全消除，因而不能忽视人民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要构建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激励机制，激发社会创新活力，避免陷入“福利主义”陷阱。

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立起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21]。既要坚持促进效率提高的理念和政策，又要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享发展成果。一是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二是在经济运行过程方面，要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确保各要素平等参与收入分配，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推进共同富裕。三是在收入分配体制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充分激发“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的三轮驱动作用^[22]，搞好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合理调节城乡、区域和行业间分配关系。

（二）统筹共建与共享，在全民参与中推进共同富裕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要统筹共建共富和共享共富，打造全社会勤劳创新致富的发展环境。共建与共享是共同富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共建解决的推动共同富裕“依靠谁”的问题，即共同富裕必须是所有人都参与，靠大家一起奋斗勤劳致富；共享解决的则是推动共同富裕“为了谁”的问题，即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应只被少数既得利益者获取，而应当被全体人民共同分享。推动共同富裕，既要激励全体人民发挥创造潜能来实现“共建”，又要基于合理的分配制度来实现“共享”。

如果按照共建和共享两大维度建立纵横坐标系，可以得到四种组合：一是“少数人共建+少数人共享”，这是一种只有增长而无分配、只有效率而无公平、只有激励而无调节的达尔文式竞争主义发展模式；二是“全社会共建+少数人共享”，这是一种带有剥削特征的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不平等发展模式；三是“少数人共建+全社会共享”，这是一种类似“福利主义陷阱”的缺乏效率的发展模式；四是“全社会共建+全社会共享”，这是一种人人参与发展、人人共享发展的模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之路。

实现“全社会共建+全社会共享”，应以人民为中心，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有效的发展激励。一是更加强调“机会公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更多人创造公平创富的环境，实现阶层和收入的合理流动；二是在全社会营造“勤劳致富、创新致富”的氛围和环境，做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普惠性政策配套，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三是完善包括知识产权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在劳动创造过程中能够获得应有成果，形成全社会勤劳创新致富的有效激励。

（三）统筹物质与精神，在防止人的异化中推进共同富裕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人的共同发展。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了“英格尔斯效应”，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23]。这意味着，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求物质上富裕，而且要求精神上富裕，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防止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

实现现代化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仅包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且包括对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因此，要解决新时代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促进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协调。一是加强基础教育资源投入，强化对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加大对知识扩散和知识培训的力度，使人民能够提升发展自身的能力，不仅仅“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通过解决“能力贫困”来解决“物质贫困”，进一步解决“精神贫困”，在知识和技能上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二是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为最广大人民提供更高精神品位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使人民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时，也能够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防止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异化。

（四）统筹区域与城乡，在经济协调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现代化，在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总会有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后发展起来的地区。长期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主要是体现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尽管总体上经济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总体上的高速度与结构上的不均衡是相伴而生的。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区域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了，内陆地区发展落后；二是城市地区发展起来了，但农村地区发展仍然落后。这两大问题本质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阻碍。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只是关注城市和先发展地区现代化的先行，更要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为了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应该加快步伐、集中力量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摆在共同富裕问题的重中之重。

一是完善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支持体系。针对区域差距，要充分发挥新发展阶段中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作用，推动实现区域发展再平衡；针对城乡差距，要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实现城乡发展再平衡。

二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东西互补、城乡互济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重塑地区和城乡在双循环中的生产与消费定位，充分结合先发地区和后发地区的各自优势，形成互补型经济格局。

三是推进区域间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进一步放开户籍制度限制，破除人口流动壁垒、身份歧视等障碍，促进要素在城乡、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促进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四是在区域层面构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帮扶与发展共享机制，完善建立东西部协作项目建设，提高产业政策的帮扶力度，增加中西部人力资本投资，优化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帮扶方式和举措。

（五）统筹“提低”与“扩中”，在分配结构再平衡中推进共同富裕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是关键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有其长期性和艰巨性。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推进共同富裕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提低”，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提升，也就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二是“扩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重，将收入结构从两极化的“哑铃型”转变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凝聚全社会关于共同富裕的共识，做好系统推进和重点突破。

要通过统筹“提低”与“扩中”来实现分配结构再平衡，重点在以下方面进行推进：一是确定相对贫困的底线标准，通过不断提升这一标准来推动共同富裕。就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脱贫攻坚明确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底线一样，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时，也要以位于收入水平底部的居民收入提高为着力点，根据美好生活的要求，使低收入群体的

“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有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贫困的底线会不断被提高，相对贫困的底线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共同富裕才能基本实现。二是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使低收入者“增收”和“稳收”，特别是针对农民工和小微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育中”，给予农民工在就业、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同等权利，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扶持^[24]。另外，对已形成的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托底，防止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后，再滑入低收入群体，这就要求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增加公共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通过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张来实现分配结构再平衡，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Reform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 2021(20):4-8.
- [2]彭慕兰.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 史建云,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 [3]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 刘北成,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 [4]王国斌. 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5]李伯重. 重新认识历史: 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及其变化[J]. 中国图书评论, 2007(2):84-91.
- [6]王正毅.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2.
- [7]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 黄胜强, 许铭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8]托马斯·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M]. 巴曙松, 陈剑, 余江, 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9]袁红英. 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框架体系与实践方略[J]. 改革, 2021(5):18-28.
- [10]李军鹏. 共同富裕: 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J]. 改革, 2021(10):12-21.
- [11]郭晗, 任保平.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J]. 国家治理, 2021(37):2-6.
- [12]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375.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七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464.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495.
- [15]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172-265.
- [16]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466.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712.

-
- [18]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 2021(9):4-18.
- [19]任保平. 全面理解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J]. 社会科学辑刊, 2021(6):142-149.
- [20]洪银兴. 以包容效率与公平的改革促进共同富裕[J]. 经济学家, 2022(2):5-15.
- [21]李培林. 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2):4-21.
- [22]唐任伍, 孟娜, 叶天希. 共同富裕思想演进、现实价值与实现路径[J]. 改革, 2022(1):16-27.
- [23]英格尔斯. 人的现代化[J]. 殷陆君,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7.
- [24]李逸飞. 面向共同富裕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探究[J]. 改革, 2021(12):16-29.